

明清史从说

作者基于宏观的视野，在海内外明清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提出了若干有关明清帝国的重要议题，并加以考辨、梳理、分析，言简意赅，展现了流畅的叙事笔墨，几乎囊括了他在这一领域内的重要创见。

汪荣祖 著



明清史丛说

汪荣祖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桂林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清史丛说 / 汪荣祖 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3. 6

ISBN 978 - 7 - 5495 - 3176 - 9

I . ①明… II . ①汪… III . ①中国历史－明清时代－文集
IV . ①K248.07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13119 号

出 品 人: 刘广汉

策 划: 阎海文

责任编辑: 阎海文

封面设计: 秋水书衣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21 - 31260822 - 882/883

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景盛南四街 15 号 邮政编码: 101102)

开本: 690mm × 960mm 1/16

印张: 17.5 字数: 220 千字

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弁 言

最近十年来,我曾写了一些有关明清史的文章,原想写一部论述明清社会文化史的大书,终因其他方面的研究与写作一时未能完成,无力分心,难任“艰巨”。这本丛说收录的十三篇文章,可分两类,一类是论文,一共九篇;另一类是评说,一共四篇,多半是书评。这些文字只能说是我研读明清史的一点小收获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动征稿,愿意出版,殊感幸慰。

历史研究固然要重视时间,但空间并非一成不变,随着时间的进展,沧海桑田,空间也在变化。明清帝国的扩张尤其显著,从东亚大陆一直延伸到中亚。《明清帝国的空间》一文即在论述帝国开疆辟土的经过,点出帝国景观的分布,以及庞大空间的联系。明清五百年的可观发展也在环境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,《明清帝国的生态危机》就在于检视这几百年中的环境变迁,包括森林面积的迅速减少,以及发生在十六七世纪小冰期的影响,探讨危机之由来,何以环境日趋恶化。一言以蔽之,人为的破坏与气候的异变形成生态危机。明清时代的有识之士虽一再警告必须善用自然资源,但积重难返,毕竟利用资源求生胜过保护自然。所谓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,不像西方文化要征服自然,而与自然为友,证诸明清史并非实情。中国一如其他文明,也为发展付出了深重的代价。不过,明清帝国的成长,不仅是开发资源,提升经济,而且在文化上也有不可磨灭的成果,知识借由书籍的大量流通而传播,虽未能达到现代的普及程度,但无疑出现了堅硕的知识阶层以及市民读者群,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活动,《明清帝国的知识制作与传布》一文就是叙述此一相关问题的。

明清两朝可视为一个整体,其间颇多相陈的关系,洋人称之为“中华帝国的



晚期”(late imperial China),然而也有变迁,满族毕竟是以关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,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旧制,不能不对承继的中国有所调适。满人何以能一统中华,其故诚多,不一而足。其中不能无视逐鹿中原的领导人物,何人胜出,似非偶然。《李自成、吴三桂、多尔袞在甲申年的选择》一文即讨论此三巨头的成败,关键在各人所选择的策略:比较之下,多尔袞所选择之策略,无疑要比其他两位高明。多尔袞率满洲铁骑南下,明南都虽有江南之富,长江天堑,竟不能维持几年。南明京城位于六朝故都的南京,规格不下于北京,秦淮河畔风华最盛,然而满族入侵,顿使繁华成空,幸存者深感家国之痛,兴亡之悲。当故国恢复无望,遗民们唯有怀念逝去的风月、承受故国之沉哀。收录在本书里的《秦淮风月与南明兴亡的书写与记忆》,以幸存者余怀亲见的秦淮盛况,道出风月与兴亡,以及从生于清初的孔尚任经由其历史剧《桃花扇传奇》,刻意写出秦淮风月与亡国悲痛的完整故事。孔氏写的是传奇,而非史传。但是所撰《桃花扇》一剧的艺术创造,将秦淮风月与南明兴亡的悲思极其传神地呈现出来。由于内容的动人以及文笔的高超,受到广大而持久的欢迎,直到民国以后,仍然有人将之改为新式的舞台剧,或改写为新式的长篇小说,或拍摄电影。于是明季风月与兴亡悲剧性的美感,通过孔尚任的笔墨,成为难以磨灭的集体历史记忆。但经由文笔书写所刻画的历史记忆并不一定然是真实的历史,文笔并不能取代史笔,但史笔远不如文笔之更能刻画集体的历史记忆。

《从明亡到清兴》综述 17 世纪皇朝赓续的过程,其中不无兴亡的硬道理,人谋之臧否仍然是主因。统治庞大的专制国家,若无贤君能臣,必然如小孩驾大车,无从面对危机,驶向坦途,更无论应付罕见的气候异变,以致民不聊生,官逼民反,给关外满族以可乘之机。满族以少数民族而能够一统中国,更非无故,努尔哈赤、皇太极、多尔袞不仅英明且有远略,终于在中原大地建立政权。大清帝国经过康、雍、乾三位君主的经营,雄立东方,版图深入中亚,疆域之辽阔,前所罕见。近年不少欧美学者有鉴于帝国之庞大,种族与语言之异趣,遂谓大清帝国与异于中国,进而否认满族汉化之事实,号称“新清史”。此大清非中国之论,似是而非。且不说大清君臣莫不以中国自称,清廷始终以中原为根本,北京为都城,一如 19 世纪之“大不列颠帝国”(the British Empire)以英伦三岛为根

本，岂能说日不落的大不列颠帝国非英国乎？《大清帝国的汉化争议》一文就是回应新清史而写。及至近代，清朝与中国更成为命运的共同体，同受列强欺凌，而图谋富国强兵。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、陷北京，清政府痛定思痛而有自强运动。北洋海军的建立，可谓自强的高峰。然甲午一役，大败亏输，几全军覆灭，其故非一。《论清季自强运动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》聚焦于贪污腐化，导致新政之事倍功半。此非事后之聪明，实当时人如郭嵩焘、丁日昌辈早已洞见，只是积习已深，不能改弦更张，以致败亡。谓之“关键问题”，岂不宜哉？

清帝国倾覆之前的最后掌权人物为叶赫那拉氏，以慈禧太后闻名于世，实际统治大清帝国将近半个世纪。不同社会背景与意识形态的人，对同一个慈禧太后，出现形形色色甚至离奇怪诞的记忆。民国成立前后，由于国家积弱的伤痛，以及康有为、章太炎等言论界巨子的影响，在华人社会的集体记忆里，慈禧成为前朝罪恶的化身。记忆与历史不尽相同，每一个人都有记忆，都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，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更是社会的产物，经长期累积而成，往往真假莫辨，信以为真；历史则要讲究客观可信，尽量澄清往事的真相。记忆是对往事的一种重演与回顾，而历史必须解释往事，产生历史意识。《论叶赫那拉氏》一文以这位女主作为个案来说明记忆与历史之异同，历史学家凭借可靠的史料与理性考证，可以呈现比较真实的叶赫那拉氏之一生，但仍然难以取代存在于华人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集体记忆。

本书的“评说”部分，乃是平昔阅读明清史的若干心得，偶有所见，未敢自秘，一得之愚或亦可供读者之参考。

汪荣祖

写于台湾新北市林口未来之丘

2012年11月7日

目 录

弁言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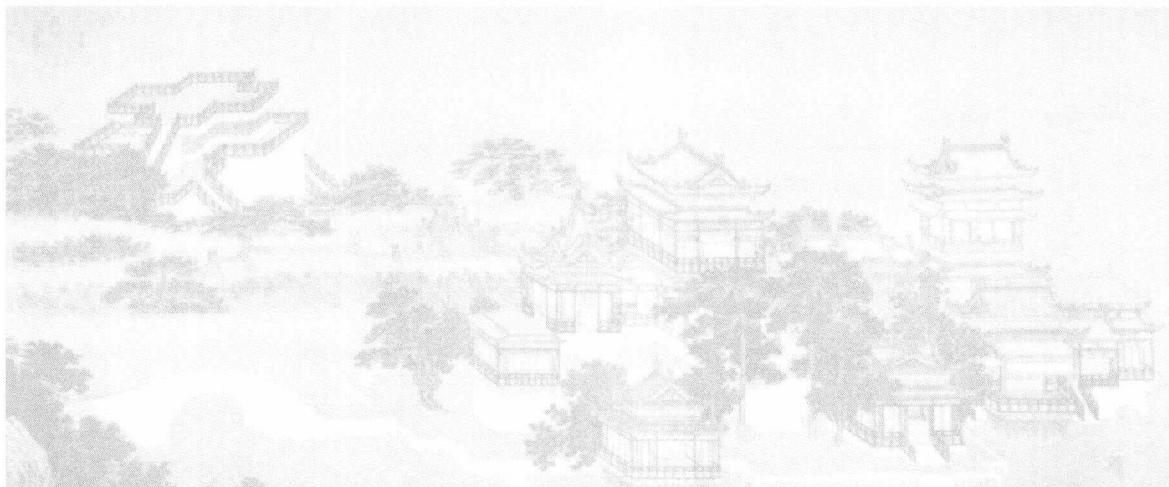
论 说

一、明清帝国的空间	3
二、明清帝国的生态危机	46
三、明清帝国的知识制作与传布	81
四、李自成、吴三桂、多尔衮在甲申年的选择	98
五、秦淮风月与南明兴亡的书写与记忆	114
六、从明亡到清兴	146
七、大清帝国的汉化争议	177
八、论清季自强运动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	190
九、论清后叶赫那拉氏	204

评 说

十、晚明消费革命之谜	237
十一、梦忆里的梦呓	245
十二、《清朝征服中亚记》书后	257
十三、解读圆明园西洋楼	265

论
说



上页图:(明)仇英《清明上河图》(局部)

一、明清帝国的空间

引言

“地理决定论”(geographical determinism)以为历史完全是地理环境的产物，固然言过其实，也不为多数史学家所能苟同。然而，史家却不能不考虑到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。事实上，任何一群人，生存在特定的空间里，势必要受制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^①，例如气候对人文的影响，就至深且巨^②。中华帝国自秦汉到明清，在特定的一个地理环境之中，绵延两千一百余年，呈现出来的不仅是时间的承续与朝代的兴衰存亡，而且是空间的自然条件对历史发展、心态、布局与策略上的影响，以及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制约。中华帝国发展到明清，领土不断地扩大，形同西方帝国主义的“扩张主义”(expansionism)，但“形”虽同而“情”实异。

西方帝国的扩张虽未必是精心筹划，哥伦布因为触礁搁浅，始建立西班牙帝国第一个海外城市纳维达(Navidad)，此事纯属意外。不过，最常见的是由于经济利益与商业扩张之需。例如罗马人之所以征服埃及出于对谷物的需求，英国在加勒比海的扩张，则由于想要获致急需的糖，大英帝国的英国文明随贸易而兴隆；跟随商业的扩张，往往不需要借助武力就能扩张到全世界。马克思主义者则视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“利益独沽阶段”。总之，西方帝国主义，尤其在近代，扩张领土的目的主要是经由政治控

① 参阅 Edward Whiting Fox, *History in Geographic Perspective, the Other France*, New York: Norton, 1971, p. 23.

② 参阅 Brian Fagan, *The Little Ice Age, How Climate Made History, 1300 – 1850*, New York: Basic Books, 2000. 此书述及不可预测的气候变化对近代欧洲历史事件的重大影响。



制获取经济利益。夺取海外殖民地的动机要不在移民，而在掌控殖民地的人民与资源、市场与大量廉价劳力。其结果是少数帝国主义白人宰制殖民地上多数的有色民族。

中华帝国在历史上不断受到边疆少数民族的骚扰与威胁，领土的扩张是为了保障安全，几无经济利益可言，甚至为达到安全的目的不惜劳民伤财，耗损国力，汉武帝屡征匈奴，以通西域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中国的边疆，尤其是北疆，没有天然的屏障，善于骑射的异族虽然地处边陲，在政治与文化上居于劣势，但在绵亘万里的边界上可以乘机随处突入，使中华帝国防不胜防，疲于奔命，若不能主动出击，捣其巢穴，只好退而羁縻，建墙防守。秦建长城，千余年后明代又重修边墙，足见帝国为了安全而不惜人力与物力之一斑。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后建立中华帝国者，前有元朝，后有清朝。满蒙虽在汉族眼中是异族，但是所谓蒙古与满洲征服中国、建立元与清两大帝国，绝不似近代英、法、德、日诸国，以本土为帝国的核心，向外扩张，以征服之地为殖民地或属土，而是自边陲入主中原，以中原为帝国的核心，以汉文化为主轴，以中国为其帝国之重，并自称中国。

元帝国之初，虽极力想保住蒙古认同，但仍不免成为另一个中华帝国，取汉名曰大元，并取中华庙号。元朝在实际需要下，终于建立了以传统中国为依据的政治体系，恢复科举考试，进入礼乐典章的汉文化世界^①。元末动乱也成为中国境内改朝换代的战争，如平乱者非尽蒙古人，如汝宁李思齐、福建陈友定、东莞何真，都是忠于元朝的汉将。陈友定被俘后宁死不降，最后受炮烙重刑而死，为元朝殉节^②。满人比蒙古人更加中国化，入关后在礼俗上有重大的改变^③，清朝基本上承继了明朝的制度，清帝一如汉帝之崇尚中国文化，自小研经读史，书法流畅端庄，定时前往曲阜朝圣，推广儒家教育，大量刻印经典。清帝国足以代

^① 萧启庆：《“蒙元”统治与中国文化发展》，载石守谦、葛婉章主编：《大汗的世纪：“蒙元”时代的多元文化与艺术》，台北：故宫博物院，2002年版，页188。

^② 钱谦益：《国初群雄事略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年版，页295。

^③ 郑天挺：《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》，收入氏著《探微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版，页73、79。

表中华帝国，比诸汉人政权，毫无逊色^①。事实上，清朝开创了一个和平繁荣的“中国盛世”(Sinica Pax)。固然历代没有一个朝代以中国为国号，但自汉至清莫不泛称中国，并以中国自居。中国一词原指中原，与东夷、南蛮、西戎、北狄对称。然而由于中原不断向边陲扩散，边陲也不断向中原汇聚，中国的范围也就与日俱增，其意义几同天下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多数政权，都以中国自居，汉皇朝的刘邦所继承的帝王之业，就是“统天下，理中国”^②。清道光朝黄爵滋上《禁烟议》一疏中也说“盖自鸦片流入中国”^③云云，可以概见。所以，所谓中国不仅具有政治上与文化上的含意，也是对此一特定江山的认知，康有为有句曰：“神州万里风泱泱，昆仑东南海为疆。岳岭回环江河长，中开天府万宝藏。地兼三带寒暑藏，以花为国丝为裳。百品杂陈饮馔良，地大物博冠万方。”^④即以简短的诗句道出其来有自的“中国空间”，以及康有为本人的空间观。

此一中国空间在一位外国学者眼里与康氏有异曲同调的看法，他说中国北有尼罗(黄河)，南有恒河(长江)，且有人造的密西西比(大运河)贯穿其间。黄河像阿斯旺(Aswan)水坝兴建前的尼罗河，将灌溉之水与肥沃的淤泥带到荒芜的土地。黄河、长江、运河形成一片广大的沃野，既有廉价便捷的交通工具连成一体，又形成统一的市场与社会。江南更是河流交错，沃壤千里，下接富饶的珠江，认为“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像这样的内陆河流系统，将一辽阔而具有生产力的空间，连成一体”^⑤。至明清帝国更拥有满洲、新疆、西藏，跨越三十个纬度，生态之异从亚热带到靠近北极。如此辽阔的统一国家既不见之于南亚，亦不见之

^① Ho Ping-ti, “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'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”, *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* 26. 2: (1967), pp. 192 – 193.

^② 班固：《汉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版，册7，页2112。

^③ 赵尔巽：《清史稿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年版，册38，页11587—11588。

^④ 康有为：《爱国短歌行》，《康南海先生诗集》，台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81年版，卷1，页14—15。

^⑤ J. R. McNeill, “China'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World Perspective”, in Mark Elvin & Liu Ts'ui-jung eds. *Sediments of Time: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*,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8, p. 32.

于欧洲^①。此一于近代之前绝无仅有的帝国，固然是庞大空间的庞大产物，多生态的丰富物质支撑帝国，庞大的明清帝国似乎也是控御此一庞大空间的有效机制。自上而下比较严密而又周延的帝制，担负起卫疆保土、兴修水利、拓殖农田、建城筑墙、治河救灾、开仓济民等重责大任，使能一方有难，万方支持的效果。于此可见，明清帝国依赖其空间内的生态而兴隆，空间内的生态也依赖帝国的统筹而尽其用。

空间的开拓

近代“民族国家”(nation state)的出现以及舆图绘制技术之发达，才有明确的国界，或列国之间的疆域。政治国界因有关主权，必须划得一清二楚。然而在传统帝国时代，帝国之疆域乃兵力与国威之所至，或民族与文化融合之所至，并无划清疆界的必要；数千年的中华帝国以天下自居，中华之天下乃中华文化之所被，文化认同甚至超过种族，即章太炎所谓中华民族属于“历史民族”^②，以致到近代形成一个多民族的中国，汉族虽然一直占大多数，但中华民族并不等同汉族。而且居绝大多数的汉人已杂有他族的血液，而他族也大都已经汉化。

中华帝国自秦汉以降发展到明清，种族与文化已经多次征服与融合，已经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统一体。清帝国由满族所建，入主中国，为了巩固基业，大步向西迈进，征服蒙古，收新疆入版图，势力直达中亚，扩大了中华帝国的疆域。事实上，朱明于14世纪推翻庞大的元帝国之后的势力范围已经不小，不仅收复了两宋所失去的燕、云、甘、陇，而且兵威伸入塞外。不过，元朝退回蒙古本土之后，主力犹存，明成祖永乐又五度远征沙漠，虽成功地击败蒙军，但由于粮草不济，难以深入，终不能彻底歼灭敌人，不仅不可能完全承继元帝国的广袤空

① 参阅 McNeill, “China'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World Perspective”, p. 32 – 35.

② 有关章太炎“历史民族”的分析参阅 Young-tsu Wong, *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: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, 1869 – 1936*, Hong Kong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89, p. 27 – 28.

间,而且来自北方的威胁始终未解,只好采取防御措施,着力修建居庸关至山海关的关隘,凭借燕山而建城设防。到16世纪后期,北边威胁日增,始大规模重建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长城防线。明代长城约12,000余里,北经京师一段,依山兴建,气势宏伟,沿线共筑九个边防重镇,东起鸭绿江边的辽东,经蓟州、宣府、大同、山西、延绥、宁夏、固原,西至甘肃,号称“九边”。

明初国力犹盛,沿长城内外而设的九边,并非国界,而是汉蒙两族南北对峙的防线。永乐皇帝驾崩之后,不再耗资远征,但当时蒙族没有雄主,草原分裂,难有作为,而明廷分化其部落,并开马市以为羁縻,故北疆尚称安宁。然至15世纪初叶,明宣德皇帝以后,蒙古出了新一代的强人也先,攻打并收编附从明廷的蒙族,骚扰边城,势力又渐渐向南扩张。当也先攻打大同时,明英宗轻听宦官王振之言,于1449年率大军御驾亲征,结果冒进遇伏,王振被乱军所杀,英宗在土木堡被俘。也先挟英宗兵临北京城下,要求迎驾,幸能臣于谦处置得宜,死守挫敌;也先屡战不利,又闻勤王之师将至,遂大掠而归。^①

土木堡之变后,明廷易攻为守以防堵北方的蒙古人,开始筑城,于成化十年修成自清水营到花马池长达1170里的边墙,沿边分布数以百计的城、堡、墩、台,后又于16世纪的30年代重新修筑了300余里的花马池边墙,完成了自宁夏向东经盐池、定边、靖边、横山、榆林、神木到河曲的一段长城。到嘉靖中叶又先后动工三次,一共修筑了1930余里,完成从山西西北黄河东岸起,经过大同、宣府到居庸关的一条“外边”,以及西由偏头向东经宁武、雁门、平型、龙泉、倒马、紫荆等关口,到达居庸关的一条“内边”。直到万历初年,仍在修墙,然由于满族的崛起,所筑多在东边。辽东方面的边墙始自正统年间,先“编木为桓”,再“易以版筑”,至嘉靖时完工,由山海关向北到广宁,再南下跨辽河向东北而去,再经辽阳、沈阳、铁岭的外围,北抵开原,再自抚顺往东南,经今安东凤城而抵达鸭绿江边。西边的长城较小,平均高度只有457.2厘米(15英尺),但靠近东边约804.67千米(500英里)的城墙平均大约有1,066.8厘米(35英尺)之

^① 有关土木堡之变的专文可参阅 Frederick W. Mote, “The Tu-mu Incident of 1449”, in Frank A. Kierman, Jr. and John K. Fairbank eds. *Chinese Ways in Warfare*, 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74, p. 243–272.

高,609.6 厘米(20 英尺)之宽,每半英里就建有瞭望台。^①

明代新建长城主要为了防守,蜿蜒万里的边墙像一条境内的马其诺式的军事防线,防线也不时随着双方实力的消长而移动。蒙古人曾人居河套,明人也曾在边外设立卫所。明朝实力式微后,不得不改变早年设九边为以攻为守的战略,而以边墙作退守之计。不过,长城南北并不仅仅是对峙,双方也多有来往与交流,实际上仍然在延续秦汉以来夷夏冲突与融合的历史,汉蒙两族在对边各有几十万的居民,汉人移往蒙古务农从商者尤多。汉蒙间的通商无论官府或民间早有历史成例,而双方也有互补的商品,如蒙古的马匹与汉人的粮食和织物都是对方亟须的。然而,明廷缺少具有远见的政治家,未能充分利用通商贸易来消弭在边界上的对峙与冲突。

明朝曾积极经营东北边疆,洪武时已经固定辽东守卫,永乐元年(1403)松花江流域内附,设立建州等卫,永乐七年(1409)又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^②。但国势渐衰后,不仅未能开拓,反而退缩,然晚明仍保有辽东。朝鲜则为藩属,洪武二年册封为高丽王,于明始终忠顺,明亦对朝鲜特别礼遇。明朝的西疆则到达黄土高原上的甘肃,开国君主朱洪武以及他的儿子朱棣曾不断地向大西北招抚,建卫册封,尤其想经营哈密,欲其“统领诸蕃,为西陲屏障”^③。不过,当蒙古势力强盛的时候,哈密就成为蒙古的附庸,明朝的西北范围实力只能及于肃州,退守嘉峪关。西疆自青海、西康南达喜马拉雅山麓以及缅甸与云南之西,在西藏分设乌思藏都司与朵甘都司,和印度结邻。藏族是中国西南最主要的少数民族,居住在西藏北边与东边的藏族,史称羌人。西藏与唐朝关系最密,与蒙古也亲近,虽然与明朝的政治关系冷淡,文化上的影响并未中断。

四川西南土司也相继归附,云南在元代已经是行省,洪武十五年置承宣布政司使,设孟养宣慰司、木邦宣慰司、孟艮府、车里宣慰司、临安府、广南府。明

^① 此段叙事主要参考夏德仪:《明代的长城》,《“国立”台湾大学十周年校庆专刊》(1956 年 3 月),页 63—64。

^② 见徐溥等编:《明会典》,台湾:商务印书馆,1983—1986 年版,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,卷 109。

^③ 参阅《明史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7 年版,卷 329。

代之云南包括渭公河北岸之地，今缅甸中部，寮、泰北部均在境内。^① 明初于贵州设宣慰司，永乐十一年（1413）后渐渐开发建置，于15世纪初建省。云贵之外，明朝的南边诸省广东、广西，以及两湖与四川，当时还较落后，少数民族人口仍然很多，由其本族人管理，史称土司。明代计有800个军政土司，650个民政土司，直到民国时代才完全消失。^② 此外，安南曾于1406至1427年设交趾布政司，琉球进贡称藩。不过，明代的边疆政策原在羁縻，实际上并不能掌控部落的内部事务，故亦叛服无常。

明代的海疆蜿蜒约6,437.38千米（4000英里），虽泰半不利于航行，然辽东与山东两半岛沿岸以及杭州湾以南到越南边境，颇多良港与深水湾。长江以及黄淮三大河流的出海口，经久泥沙淤积浅海，不断产生新生地，滨海城镇成为内陆，交通改道等现象。中国拥有绵长可资航行的海岸线以及众多的海港，不可能不是一个海权国，故自唐宋以来，中国于船舶建造，海运与港口设施，以及航海技巧都占世界领先地位。隋代已能建造长20.22米，宽2.82米，载重23吨的双体海船^③。唐代造船技术有所突破，泉州所造福船，长18丈（约59.94米）、宽4丈2（约13.99米），高4丈5（约14.99米），可载1250吨到2500吨货物，为世界最早的尖底深水龙骨船，使唐代轮舟驰骋海上，远扬波斯湾^④。由于海上贸易繁盛，唐廷在广州设立市舶司，由广州通往各地。宋元时期航海知识与技术更有进一步的发展，诸如船舵的改良、水密舱的使用、防摇设施、航行工具的创新，远洋船只体积也更加庞大。明初航海事业继续辉煌，仍然举世无匹，远航至朝鲜、日本、菲律宾、南洋各地，来自阿拉伯以及波斯等国的外国船只也云集闽粤港口，泉州尤著称于世。私家海商也拥有海船。郑和七下西洋，尤称盛举，所乘一号宝船载重估计超过7000吨，与哥伦布的坐船相比，真大巫与小巫之比。但明于开国之初，即有丞相胡惟庸勾结日本之大狱，故不时以海禁换

① 参阅王恢：《中国历史地理》，下册，台北：学生书局，1978年版，页1153—1154。

② 土司数目根据龚荫：《中国土司制度》，昆明：云南民族出版社，1992年版，页57—63。

③ 山东平度新河乡于1975年出土此船残骸，见王冠倬：《中国古船图录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2001年版，页93—94。

④ 参阅穆根来等译：《中国印度见闻录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年版。



取安定。然而海商利益之所在,情愿冒险,因而禁不胜禁,反而引发走私与海盗猖獗。16世纪的倭寇大乱,东南沿海烽火处处,明廷虽尽全力平乱,但终明之世,终采守势以卫海疆,多少约制了海洋事业的开拓,郑和的壮举并无后续的发展,成为昙花一现的偶然。^①

明帝国实际掌控的领土,固不能与后来的清帝国相比,然就其势力范围而言,东至日本海,北入沙漠,西接中亚、印度,南临南海,疆域已甚辽阔。汉族所居的中原,大河上下,大江南北,包括南直隶(明廷北迁后改称直隶,含江苏、安徽)、北直隶(北迁前称北平,含民国时代的河北与察哈尔、热河一部分)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广(湖北与湖南)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(今陕西与甘肃)、福建、广东、四川,以及云南,府以百计,州县以千计,幅员堪称广大,人口于明初已达6500余万。^②当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于16世纪来到中国,由澳门到广州,北上南京,再入居北京,直到去世。他在中国感受最深刻之一就是版图之大,据其估算,涵盖的范围从北纬42度延伸到19度,从东经112度延伸到132度,认为此一疆域已经超过当时世界上其余所有王国的总和^③。

清朝龙兴于辽东边墙之外,原是女真族居住之地。明朝开国之初招抚而后建置卫所,成祖朱棣所建卫所受辽东都指挥使节制,从西面的俄鄂嫩河到东面的日本海,设卫百余所。永乐九年(1411),卫所更设立到黑龙江的支流,势力范围包括了广大的东北地区。一直要到17世纪女真崛起之后,改称满洲,才取代蒙古成为明朝北方的威胁,最后并吞汉蒙,建立了横跨中亚与东亚的大清帝国。

满族原是明朝附庸,号称建州,至努尔哈赤始有异图,建立八旗,意欲建邦兴国,并取代明朝而为中国的共主。皇太极更积极集中权力,经营辽东,屡败明军,虽未于其生前入关,其皇弟多尔衮以摄政王辅助幼帝顺治,推翻了明朝,建立统治全中国的新政权。顺治早崩,康熙八岁登基,又由鳌拜摄政。至康熙亲

① 参阅王冠倬:《中国古船图录》,页98、142—152、263—264;徐玉虎:《明代郑和航海图之研究》图袋,台北:学生书局,1976年版。

② 参阅 Ping-ti Ho, *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, 1368 – 1953*, 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59, p. 10.

③ 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,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1年版,页7。